

【文化杂谈】

书信拾起岁月

□孙葆元

当数字化的微信时代到来,纸质书信已经乘着它的驿马渐行渐远,只留下一个背影。人生在世,总要交流,条件允许时面对面地交流,无法面对面时就靠“信”交流。“信”:消息。汉朝扬雄说“阳气极于上,阴信萌乎下”,是说万物的消息在大地上传递。汉朝传递消息的人,司马迁称其为“传信臣”。信之于邮递,之于微信,是传输手段的改变,信的内容没有改变。手段的改变是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,近代的交通工具驱赶了驿马、驿使、驿卒;数字化替代了已经慢下来的交通邮传,一路走来,构成了我们的邮政史。

书信从来都是历史的一部分,二十四史是靠当年的“消息”构成的。事实上,史家就是收集、整理、梳理消息的学者。有些消息被采纳,入史了;有些消息未被采纳,未入史籍,但它仍然是第一手史料。这就是书信的历史价值。历史价值往往是当下不被看做“价值”的弃品,消息沉淀为历史,它的价值就彰显出来了。原来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形成的。

济南经一路91号坐落着“华夏书信博物馆”,是国内唯一一间书信博物馆。一座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年(1904)的巴洛克风格建筑雄踞街头,当年的用途是中国最早的电讯大楼,也是中国通讯由书信传递走向现代化电讯的始发地。走进这座大楼,其实是走进了百年邮驿史,一步步走进了20世纪初的1904年。那年山东巡抚周馥联合直隶总督袁世凯,奏请光绪皇帝开辟新的济南经济区,与世界接轨,获准开埠。济南商埠开建的同时,这座适用于近代工业化的电报大楼同时破土兴建。电报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,这座楼距离电报发明只间隔了七十年,由此被命名为“济南府电报收发局”,百年来济南人称它为“老电报大楼”。楼体两层,占据着经一路和车站街的交叉口,呈现东与南两个立面,青石基座,墙体用花岗岩镶嵌。整座楼看上去像一座欧式古城堡。今天,走进这座楼,走进书信博物馆,其厅堂豪华,有东西两道楼梯通向二楼,窗户临街开放,仔细看,窗上的插销仍是原来的配件,把手是一个杠杆,铁销直接贯通上下窗框,能把窗口严严实实地锁死。窗上设横向开合的黑色木质百叶窗,与今天的百叶窗迥然不同,往昔岁月的风采至今犹在。

老电报大楼经百余年风云,经历战火弹雨洗礼,至今墙体上仍残留着昔日的弹痕。经一路扩展,楼体阻挡要冲,当地群众爱惜陪伴他们百年的老建筑,群起吁请,使其得以整体移动而保存,修缮改造,焕发新颜。改造完成后规划用途,有关部门摒弃了商业利益,将它建成国内首座书信博物馆。里面陈列着中国邮驿的史料和大量名家书信手迹,向已经走入微信时代的人们讲述书信的故事。由是,我们看到许多未被拾起的历史细节。

陶行知(1891-1946)是驰名近代的教育家,我们只知道他叫陶行知,却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名字,叫“陶知行”。书信博物馆内收藏着1922年6月21日他给当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一封信,推荐儿童作家戴白桃的儿童科学故事,兹录于下:

云五先生大鉴:

久未晤教,曷胜悬念。现戴君白桃有儿童科学故事一册,特为介绍如琴,收买即行当与儿童有益。白桃君近年研究儿童科学颇有心得,所写文字亦合儿童心理,专以介绍。敬祝康健。

弟陶知行启

如不是亲笔书写,会怀疑此乃笔误。其实所写无误,他时常用“行知”和“知行”署名,这封信的落款就是“知行”。1934年,他在《生活教育》杂志发表《行知行》,说“行是知之始,知是行之成”,改名为陶行知。知是学习,行是实践。陶行知者,是在实践中学习;陶知行者,是在掌握了知识后的再学习。如果没有这封信,今天的我们只能从书籍中记住他的第一个名字,不会知道他名字颠倒一下生出的新意。这既是一个文学创意,又是一个有趣的故事。

馆内还收藏着词作家乔羽先生1959年3月写的一封信和一首歌词,信显然是写给某位作曲家的。信中写道:“歌是为了唱给别人听的,要让人一听就懂、回味无穷。这就要求歌词必须做到寓深刻于浅显,寓隐约于明朗,写曲折于直白,寓文于野,寓雅于俗。”他讲出了文艺创作的辩证,也是新时代歌曲遵循的基本创作原则。他的歌词为什么广受受众欢迎,传唱不衰,这封信道出了其中的原委,是歌曲服务于时代的基本法则。今天,当我们的歌词走向文化的迷茫,曲的旋律荒腔走板,读读这段话,是不是有一定意义呢?

书信是日常生活里的表达,精彩纷呈,构成日常生活的艺术。我们看到的行书法帖《快雪时晴帖》就是东晋时王羲之在一场雪后写给一位张姓友人的短信:“羲之顿首,快雪时晴,佳想安善,未果为结。力不次。王羲之顿首。山阴张侯。”这是一封回信,他肯定是接到了出行的邀请。“力不次”是说,这边刚下了一场雪,脚力不易外出远行。空口无凭,怕传信人为难,故写一纸,墨字为信,请送信的人捎去问候。区区数字,匆匆草成,却成就了书法艺术的旷世经典。

我们读到的古代散文《报任安书》是司马迁给友人任安的一封信,此时他已遭受腐刑,信中陈述了以残生创作《史记》的心路历程,全篇充满屈辱中的执着,奄奄一息中的顽强。若不是这封信,我们很难知道《史记》背后的故事。司马迁为先贤立传,这封信则是他自己的传记,在娓娓叙说中波澜浩荡,展示出史官的责任、历史的担当,令人肃然起敬。这何尝不是司马迁留给历史的一封信呢?

同样饱受人格侮辱之苦的还有苏轼。从传略中我们只知道他被贬谪海南儋州,不知道他在那个蛮荒之地的生存状况。从苏轼给一位资助他生活物资的程秀才的书信中可略窥一斑:“某启:去岁借舍屡会,当时不知为乐,今者海外岂复梦见。聚散忧乐,如反覆手,幸而此身尚健。”在说完这些感叹的话以后,他讲到了自己的近况:“仆离惠州后,大儿房下亦失一男孙,亦悲怆久之,今则已矣。此间食无肉,病无药,居无室,出无友,冬无炭,夏无寒泉,然亦未易悉数,大率皆无耳。”他失去了所有的生活物资,为了生存,只有自己动手,“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居之,仅庇风雨,然劳费已不赀矣。赖十数学生助工作,躬泥水之役,愧之不可言也。尚有此身,付与造物,听其运转,流行坎止,无不可者。故人知之,免忧。”若没有这封信,我们怎知苏轼的这一面及他当时的生活状态?

书信经过竹筒形式、丝帛形式、纸质形式,发展到数字传输形式,通过驿卒、驿马、驿站到万国邮联,又从邮政到今天的微信。华夏书信博物馆里有所有这些传输的模型,展示了一部人类的书信史。改变的是传输的形式,不能改变的是书信记载、叙说、通知的本质,永远是在不能晤面情况下的文字表达。当我们看不到手写的文字和来自远方的信封、邮票,那些微信中的文字似乎失去了一些温度。

□刘荒田

五十多年前的知青时代,我读了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著作《出了象牙之塔》。这本书痛诋日本人的“虚伪”,举的例子中有一个,是学生以“红包”的形式给塾师送上报酬。塾师不当面打开,但如果给少了,便愤愤不平,想着要给点颜色看看。作者将这种现象归结为:为了面子上好看而掩盖物质上的贫乏。我感兴趣的则是东方民族的一种特性:人际交往上,比较爱好暗示,因而招致误会。拿现代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契约精神来说,它的前提是具有“契约”,有些人却在有意无意间以“暗示”代替明码实价。

且举一个例子。中国人C君是居住在美国旧金山的企业家,经营摄影器材,在全美开了十多家分店,生意做得有声有色。他二十多岁才从国内来这里,留学加上创业,一路奋斗,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。他把亲情看得特别重,不遗余力地提携姐妹以及她们的后人。他对亲人说,今天我们依然要抱团。C君的姐姐一家住在纽约,儿子从大学毕业,姐姐要弟弟帮忙。C君说,外甥的专业对口,来我的公司上班好了。年轻人从东海岸飞来,入住C君家。C君夫妇把外甥当作自家孩子,平日一起吃饭。外甥在C君的公司干了两年,对舅舅说,对这一行失去兴趣。C君说,你有选择的自由。年轻人跳槽到本市一家软件公司,仍然在舅舅家食宿。十年过去,外甥年过三十,和纽约的一位女子谈恋爱、结婚,这才离开旧金山,与父母团聚。

这件当时受各方赞同的好事,后来却导致兄弟不和。外甥离开后,没有给舅舅、舅母写过只言片语,连节日的例行问候也没有。C君的太太很是困惑:哪里对不起他了?C君出于关心,多次给老姐打电话,询问外甥的近况。姐姐说他很好。C君再追问,姐姐竟抱怨弟弟“不会做人”。C君惊问因由,姐姐说:“这十年,我把独生子送去,陪伴你,替你打工,我们两口子在这边有多寂寞,你知道不?”言下之意,即使向你要“亲情补偿费”也合情合理。

C君哑然:这话从何谈起?我自己有三个孩子,管教已够吃力,怎么还巴不得你送一个孩子来?外甥在我家食宿十年,从来没交过一毛钱,我不计较,却变为倒欠!

C君就此事作自我检讨,认为错在开始时没有订立契约。本该明明白白地宣示:外甥此来,作为雇员,他的待遇如何;作为亲戚,他有哪些权利和义务;还要分别以老板和舅舅的身份,在公、私两方面都划下界限,让年轻人从理性上明白自己的身份;外甥在舅舅家的待遇如何,什么该做、什么不该做,作出清晰说明,情面归情面,规矩归规矩。可惜,外甥来旧金山之前,姐弟之间的谈话没有触及具体问题,她一句“把他交给你了”,他一句“放心,包在我身上”,就算是交代了。

我们在生活中惯用暗示,刻意使界限模糊,以留下回旋空间。“兄弟包涵”,意思是我做了坏事可不要说出去。“一笔写不出两个X字”,背后的意思是可以合伙钻法律或规矩的漏洞。然而,在分工精细、信息透明的现代社会,糊里糊涂导致诸多不确定性,为人所不取。

一定有人反驳我的观点说,同胞骨肉之间,大功利怎么行?然而,“尽在不言中”的意会,不足之处是确凿的。别说是舅舅,哪怕是父母和子女,也不能滥用暗示。比如,如何安顿年老的父母,儿女不能以“不会亏待你”来敷衍,要把将来承担的道德责任、经济责任开列,如何照顾、开销哪里出,一概明算账,以避免“尽在不言中”带来的恶果。

【生活直击】

『尽在不言中』的弊端